

《轨道》异托邦空间中的伦理张力

——国际空间站的容器困境

李宸阳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2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4日

摘要

《轨道》中的国际空间站作为典型的异托邦, 融合了技术异托邦与伦理困境的双重特性。文章通过空间叙事与伦理学的交叉视角, 从隔离、规训与并置三个维度, 分析小说空间叙事中的伦理张力: 循环时间消解线性进步叙事导致伦理感知麻痹与责任异化; 封闭空间内的权力规训复刻政治分歧并暴露技术对身体与生命的工具化改造; 多重空间的叙事并置则凸显了全知视角下的道德冷漠、身份认同撕裂以及人类共同理想与现实政治的鸿沟。作为异托邦的国际空间站并非伦理困境的根源或解决方案, 而是技术时代全球性伦理挑战的浓缩镜像, 为反思当代人类在技术发展、政治博弈与生态危机中的处境提供了独特的叙事视角。

关键词

《轨道》, 异托邦, 伦理困境

Ethical Tension in the Heterotopia of *Orbital*

—The Container Dilemma of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Chenyang L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June 29, 2026; accepted: August 5, 2026; published: August 14, 2026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in *Orbital*, as a quintessential heterotopia, possesses the dual nature of a technological heterotopia and a locus of ethical dilemmas. Through the intersecting perspectives of spatial narrative and eth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thical tensions within the novel's spatial narrative along three dimensions: isolation, discipline, and juxtaposition. Cyclical time dissolves the

linear progressive narrative, leading to a numbing of ethical perception and the alienation of responsibility; the disciplinary power within the enclosed space replicates political divisions and exposes technology's instru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body and life; the narrative juxtaposition of multiple spaces highlights moral indifference from an omniscient viewpoint, the fracturing of identity, and the gap between the ideal of a shared humanity and political realities. As a heterotopia,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is neither the root cause of nor the solution to these ethical dilemmas; rather, it serves as a condensed mirror of the global ethical challenges of the technological age, offering a unique narrative perspective for reflecting on the contemporary human condition ami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political maneuvering, and ecological crisis.

Keywords

Orbital, Heterotopia, Ethical Dilemma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 21 世纪太空技术探索商业化等各种因素交织的背景下, 国际空间站(ISS)作为人类最复杂的跨国科技工程, 已成为技术时代人类境况的重要隐喻场域。萨曼莎·哈维的小说《轨道》(*Orbital*)中, 国际空间站被塑造为一个典型的异托邦空间: 它既是对地球的抽离与模拟, 又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微观社会系统。哈维不仅再现了国际空间站作为“容器”的物理封闭性与象征复杂性, 更在其循环轨道与动态视角中, 构建出一种伦理反思的叙事机制。在这一空间中, 宇航员既是科技的践行者, 又是伦理困境的亲历者。他们的日常生活——从资源分配到情感交流, 从地球观测到自我认知——无不映射出技术理性与人文伦理之间的张力。而文学伦理学视角则提供了理解这一张力的话语工具, 尤其在对“责任”、“归属感”与“集体认同”等伦理概念的叙事呈现中, 小说展现出深切的当代关怀。

空间封闭空间叙事作为空间叙事的子领域, 聚焦于有限物理空间(如太空站、潜艇、避难所)内的伦理冲突。福柯的“异托邦”理论为其提供了核心分析工具: 封闭空间既是现实存在的物理场所, 又是投射社会焦虑与乌托邦/反乌托邦想象的媒介。当前研究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空间隔离与伦理实验: 封闭空间常被设置为伦理困境的“实验室”。例如, 太空叙事中宇航员在隔绝环境下面临的资源分配、群体决策与生命权争议[1], 折射出人类文明的底层伦理逻辑。

技术控制与身体治理: 封闭空间中的生命维持系统与技术依赖关系成为身体治理的隐喻。例如,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疯癫亚当》系列中描绘的生物科技隔离区, 揭示了技术支配对身体的规训[2]。此类研究多融合后人类主义理论, 分析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在密闭空间中的互动。

异托邦的叙事功能: 近年来研究强调异托邦的“反射功能”: 封闭空间既是叙事情节推进的容器, 也是批判社会现实的镜像。例如, 电影《地心引力》中太空站的失序状态映射了地球上的政治分歧。而中国科幻如《三体》中的“红岸基地”则呈现了冷战思维与科学理想之间的冲突[3]。

福柯的异托邦概念自提出以来已成为分析现代社会空间实践的重要工具, 但其理论本身存在若干值得审慎对待的局限。首先, 福柯对异托邦的论述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 他在不同场合对异托邦特征的描述亦存在不一致之处, 这要求研究者应用时须依据具体文本对象进行选择性的理论调适。其次, 异托邦理论侧重于空间的共时性分析, 对空间中的时间性变迁关注不足, 因此本文在“隔离”一节中引

入了维利里奥的速度理论作为补充。

封闭共同体伦理作为文学伦理学的重要分支，聚焦于有限空间内群体成员的伦理关系与道德抉择。此类研究主要呈现三个维度的发展态势：

极端环境中的伦理实验：封闭共同体常被设置为伦理选择的“压力测试场”。太空叙事中的国际空间站、世代飞船等场景，为研究资源稀缺环境下的分配正义提供了典型案例。这类研究多借鉴菲利普·富特的“电车难题”和迈克尔·桑德尔在《正义：该如何做是好？》提出的正义理论来分析封闭环境下伦理决策的特殊性[4]。

科技伦理：封闭空间中的生命维持系统与技术控制引发了对科技伦理的深入思考。此类研究常融合福柯的生命权力相关理论，分析技术如何重塑共同体内部的伦理关系。

跨文化伦理与全球化语境：当前研究特别关注封闭共同体中的文化冲突与伦理协商。国际空间站作为多国合作的微缩社会，其叙事常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伦理观念碰撞。

文学伦理学批评虽然为分析文本中的道德选择提供了有效的概念工具，但需警惕将文学文本简单化为伦理命题之图解的风险。文学作品的伦理价值不在于提供道德判断的标准答案，而在于通过叙事形式邀请读者进入一种伦理反思的过程。这一认识将贯穿下文对小说空间叙事三个维度的分析。

2. 隔离：时间加速、循环与伦理感知的麻痹

异托邦不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而是真实存在的、不同于常规社会的“他者空间”，它们是社会通过空间进行规划、反思和倒置的场所[5]。国际空间站天然地契合了福柯所描述的异托邦核心特征。人类各个文化几乎都有一些与日常空间分离的场所，如神圣的教堂寺庙、禁忌的园陵墓地，以及专用于休闲娱乐的景区度假村。空间站就是现代科技文明所创造的一个最极致且被世人广泛接受认可的“分离空间”，在这样一个孤悬天外、空间有限、活动集中、带有浓厚科技色彩与国际政治背景的容器里，关于人类情感、身份、科技等诸多方面的伦理问题都被聚焦到了放大镜下。因此，本文从隔离、规训与并置三个维度，分析小说如何构建技术时代下异托邦空间内的伦理困境。

小说以 16 次轨道循环结构，对应宇航员一天内经历的 16 次日出日落。这种循环叙事模仿了空间站的实际运行节奏，并产生了消解线性时间所带来的进步叙事和因果逻辑的效果。空间站的时间体系颠覆了地球的线性时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时间异托邦”(Heterochrony)，这直接导致了宇航员伦理感知的变化，生成了科技时代特有的伦理困境；而太空异托邦的封闭性和隔离性又像实验室的培养皿般将复杂的全球性伦理问题剥离出来，并将其浓缩、纯化、放大，放置在一个受限的空间由读者进行观察。地球上的生老病死、生态危机(如文中的台风)是线性发展的，但空间站上的观察者却以一种“重复观看”的模式集中体验这一切，宇航员们在地球的一天尺度中度过“16 个轮回”并重复观测 16 次灾难。正如文中所述：“clinging to their twenty-four-hour clock because it's all the feeble little time-bound body knows... But the mind goes free within the first week [6].”这种时间的循环性导致了一种伦理感知的麻痹。他们目睹台风逼近菲律宾，却只能作为“提前判断台风的预言家”进行高高在上的观测和拍照，无法采取任何行动。彼得罗在执行观测任务之余与同伴内尔谈论起菲律宾的蜜月之旅以及结交的朋友时，他口中的渔民朋友正在风雨飘摇的渔船上直面台风的咆哮，这种无力感在循环中不断重复，从最初的焦虑最终演变成为一种无奈的常态。

同时，时间加速带来的影响也不止于线性叙事逻辑的消解，还有主体的挣扎与责任伦理感的异化[7]。“责任异化”(Alienation of Responsibility)指主体在技术-制度系统中逐渐丧失对自身道德义务的情感认同与主动承担的过程——不是责任的消失，而是责任感的悬置与疏离。面对时间感的消失，宇航员罗曼通过每日划线的计数方式界定“自我主体在时间尺度的存在”，不是希望时间流逝，而是试图将时间锚

定在某种可计数的事物上。这一行为揭示了人类在技术加速面前，试图通过最原始的方式保持对自身存在的确认，体现了时间异托邦中主体的伦理挣扎。在此基础上，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速度所带来的变化几乎在瞬间发生和消失，人类感知的时间性被重新定义：我们感知的主要对象是纯粹的传播速度，其已经成为我们感知经验的时间性的重要环节。空间站以每小时 17,500 英里的速度飞行，每 90 分钟绕地球一圈。这种物理上的高速运行造成了时间体验的压缩和加速。保罗·维利里奥指出，速度在带来效率的同时，也会导致一种“失神”(Picnolepsy)状态，即对现实的感知变得碎片化和疏离[8]。宇航员们快速掠过各大洲、战争区、灾难现场和繁华都市，“大陆如从火车窗口外的田野与村庄般掠过[6]”。这种“高速列车上的观光客”式的体验将复杂的全球性伦理问题扁平化为转瞬即逝的视觉奇观，技术带来的超高速移动反而异化了人类对脚下土地应有的深沉责任感。德国社会批判学家哈特穆特·罗萨担忧地认为“现代沟通网络太过庞大，以至于我们对当中的所有人或至少大部分的人，不太可能真正建立起情感关系。”[9]宇航员从焦虑到漠然的转变，并非简单的道德退化，而可以从情感抽离(Emotional Detachment)的角度加以理解：宇航员们在超高速的时间体验中体验了地球人 16 倍信息量的一天，空间层面上巨量的信息压缩反而导致了情感的麻木，带来责任的异化。情感抽离从最初的被动体验逐渐转化为一种自动化的认知习惯。小说早期段落中对台风观测的描写充满紧张与焦虑，情感密度极高；而随着轨道循环的推进，相关描写的篇幅逐渐缩短，语气趋于平缓，细节从灾难本身转向宇航员之间随意的闲聊——叙事形式的这种“冷却”本身就是情感抽离的文本体现。正是通过这种叙事节奏的控制，读者得以在阅读中经验性地感受到伦理感知的麻痹如何在不经意间发生，而非仅仅被告知这一结果。在空间站的循环时间中不仅有情感的“失神”，还有情感的延迟。日本宇航员千惠在太空中得知母亲去世，但空间站的时间流速和任务节奏不允许她按照地球上的传统和时间节律进行哀悼。她的“悲伤被悬浮在轨道上[6]”，与十六次日出日落交织，最终生成一种延迟的、异化的情感体验；类似地，内尔与丈夫相隔“天上地下”，依托着先进的通信技术互发照片与信息，但电子信号的延迟依旧追不上空间站绕轨运行的速度。内尔的丈夫在短信中说他也有苦衷，他永远不可能知道妻子正处于何处，甚至看着妻子进入太空数月后的照片都愈发陌生。这些情节具象了人在现代技术系统生成的技术异托邦中的情感反应被技术异化的伦理困境。

3. 规训：空间容器内的权力规训机制

空间站作为一个“空间容器”并非一个均质的、理想化的乌托邦，其内部精确地复刻并微缩了地球上的权力结构，是一个被严格规训的空间，从而使相关的伦理困境变得高度浓缩和可见。它生动地展示了福柯所揭示的权力如何通过空间配置进行运作，以及这种运作如何深刻地影响甚至塑造其中的个体。异托邦能够“在一个真实的地方同时并置数个本身无法相容的场所或空间”，而空间站正是并置了不同国家主权与社会身份的一个实验场，而其中伦理困境产生的根源在于该场域中无处不在的规训。

空间站内的伦理困境产生于其规训社会的本质逻辑。福柯在其《规训与惩罚》中，借助“圆形监狱”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权力通过空间进行微观运作的机制：“这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规训权力的成功无疑应归因于使用了简单的手段：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10]”。国际空间站也是一个这种规训社会的典型体现和经典样板。在空间站中，宇航员的身体、时间和行为都受制于精确的日程表，内尔的丈夫始终无法得知自己的妻子正处于何处，但事实上内尔等一众宇航员的精确坐标被实时显示在地面指挥中心的监控中，“她的坐标以精确到毫秒的轨迹运动着……除了她在太空行走那天。但即便是那天她也受到数百人监视，而且有各种各样的严格限制[6]”。此外，他们还要遵守许多充满着政治意味的荒谬规则，最典型的例子是厕所门上“RUSSIAN COSMONAUTS ONLY”与“AMERICAN, EUROPEAN AND JAPANESE ASTRONAUTS ONLY”的标识。这种划分是地面上国家间政治的直接延伸。正如亨利·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所述，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同时也生产着社

会关系[11]。这个本该代表人类团结的“太空巴别塔”，内部却根据国籍被分割。哈维的叙事巧妙之处在于，她并未对这些标识做出直接的道德评判，而是通过宇航员们对此的沉默接受和偶尔的私下调侃，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制度性的荒谬如何被自然化为“理所当然”。

空间站内的伦理困境还根植于技术规训与生命伦理的矛盾中。作为被严格规训的异托邦，空间站技术对人类身体的改造和异化变得显而易见。伦理困境不再抽象，它直接体现在宇航员萎缩的肌肉、疏松的骨骼、漂浮的体液上。“他们的动脉正在增厚和硬化……心脏肌肉正在减弱和萎缩[6]”。宇航员的身体成为权力作用的直接对象，他们必须每日进行高强度锻炼以对抗微重力导致的肌肉萎缩和骨质流失。身体被工具化，必须为任务而保持“可用”；此外，安东和千惠在实验室里培育了大量的心肌细胞与活体小鼠，他们称细胞组织为“这也是人”、称自己为“大号的小白鼠”，他们登上太空的任务远非进行浪漫的“窥视地球的美丽、感受宇宙的壮丽”。作为星际开拓与殖民的前哨站，空间站在浪漫与伟大的符号形象下是极度克制、极度理性、技术规训的内涵，宇航员们每天被严格规定的锻炼日常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给小鼠进行检测的日常。小鼠实验是这种权力结构的隐喻延伸：一组被注射药物，一组未被处理，一组被基因改造，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服务于人类的研究目的，是容器内更为底层的、被完全剥夺自主性的生命，隐喻了技术理性下生命价值的等级化以及生命伦理的困境。

4. 并置：伦理比较的张力与反思

异托邦核心的特征在于能够“在一个真实的地方同时并置数个本身无法相容的场所或空间(Juxtaposition)”。空间站正是这样一个并置了多重矛盾的真实场所：在空间站中并置了多国主权、并置了“家”与“实验室”、并置了“地球”与“非地球环境”。同时，小说的叙事技巧核心也在于并置(Juxtaposition)——将空间站内的日常与地球上的事件同时呈现，这种手法是异托邦“并置不相容空间”特性的直接叙事转化，生成了创造“伦理距离”与“上帝视角”、情感的联结与责任的叩问。

哈维的叙事并置并非简单的场景切换，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文本策略。小说采用“轨道单元”的碎片化叙事结构，每个轨道章节均由“空间站日常片段”、“地球观测场景”、“宇航员私人记忆”三个部分交织构成，三者之间没有明显的过渡段落，形成了类似蒙太奇的拼贴效果。这种叙事结构本身就模拟了宇航员在高速轨道运行中感知碎片化的体验，也让读者在快速切换的视角中直观感受到技术理性与人文情感、宏观观测与微观生命之间的伦理张力。

叙事并置首先制造了一种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伦理距离”与全知的上帝视角。当宇航员们用长焦镜头冷静地观测、分析、拍摄台风时，渔民一家正在风暴中面临生死存亡。彼得罗想到那位他认识的菲律宾渔民，内心呼喊“逃开这场灾难”时也不由得思考“又能逃到哪里呢？”彼得罗在执行观测任务时与同伴内尔谈论起菲律宾蜜月之旅的情节与他口中的渔民朋友正在风雨飘摇的渔船上直面台风咆哮的情节在相邻的章节被并置，这种并置揭示了技术赋予的“全知视角”所带来的伦理困境：看得见，却无力改变。这呼应了汉娜·阿伦特所探讨的“平庸之恶”的现代形式——并非出于直接的恶意，而是源于一种系统性的、因距离和分工而导致的道德冷漠和责任分散。

空间站作为一个异托邦，实现了对“家”与“实验室”的并置。宇航员们在太空漂泊的苦旅之中早已把这个“4 cm 厚、将自己与致命的太空隔绝开来的金属壳子”视为了自己的家，将朝夕相处的他国宇航员——即便回到地面上时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甚至敌对的国家——视为最纯粹的家人，他们发自心底地关心珍视彼此，在为肖恩的庆生排队上用各自带上太空的、珍藏的美食以及饰品装点这个茫茫宇宙中温情的“太空之家”。但当他们进入工作状态时，空间站就成为了一个布满冰冷仪器、进行科学实验的“实验室”。这种并置具象了宇航员身份认同的撕裂：他们既是拥有情感的个体，又是代表人类执行科研任务的工具性存在。当千惠在检查实验小鼠时，对着这些“注定要为科学牺牲”的生命轻声说“对不起”，

并想起自己无法为母亲送葬时，两种伦理困境——对实验动物的伦理责任与对亲人的伦理责任——通过她的个人情感并置在一起，格外引人深思。

而当宇航员们从舷窗看到一个没有国界线的、壮丽的整体地球，“他们看到它的丰满，没有边界，除了陆地和海洋之间的分界线”，此时的他们心中充斥着统一的、对地球的崇高向往，结成一个封闭空间的共同体，但转身面对的却是标有国籍标识的厕所和物资储备。这种视角的快速切换迫使他们，也迫使读者思考：为何人们在认知上能理解地球是一个整体，在政治和行动上却如此割裂？

于是自然而然地，宇航员们不得不面对一场高度“浓缩”的身份博弈：他们到底是谁？是代表着全人类通力合作探索宇宙的人类先锋还是被统治阶级选中成为大号“太空小白鼠”？是来自不同土地的具体的某些人的儿女夫妇还是一群在太空中漂泊的、除了“地球的孩子”外再无其他共同身份的“同胞”？宇航员们在“感觉世间只有彼此与远处那个巨大的蓝色星球……他们为地球的美丽与壮观而赞叹，深感自己是地球的孩子”的同时依旧会思念自己在地球上的亲人与朋友，怀念那带有强烈个人印记、文化印记的社会关系；他们在受到各自政府的政治命令约束的同时亦会偷偷聚在一起嘲笑这种荒谬的举动并为彼此庆祝、安慰。宇航员们既享受着从地球政治中暂时抽离的自由，又无法真正摆脱地面政治的逻辑，这种矛盾处境生成了一系列独特的伦理困境。关于身份博弈的困境，身份是文化与社会提供的选项中个人自主建构的结果，须同时尊重普遍人性价值与特定生命、文化的特殊价值；个体必然承载多重身份与忠诚，伦理任务是在保护自身文化的同时，与异文化他者共存[12]。当普遍关怀与合理文化差异冲突时，以对话为唯一正当的解决方式。

5. 结论

空间站作为异托邦，其力量在于它通过隔离、并置、规训等一系列空间机制，将宏大的、在地球上可能被忽视的科技时代伦理困境浓缩、提纯，并戏剧性地呈现出来。它就像一个伦理学的培养皿，让这些困境在失重状态下变得无比清晰，迫使叙事中的人物和叙事外的读者都无法回避这些迫切的追问：在技术赋予人类巨大能力的同时，伦理责任被界定在哪里？全球性共同体的理想如何穿透民族国家的现实？人类又应如何定义自身与他者、与地球、与未来的关系？上述追问并非仅限于太空探索的语境，《轨道》所呈现的“容器困境”同样映射到其他封闭的、技术高度中介化的空间中，例如数字监控与虚拟社区、南极科考站等极端环境中的群体伦理。空间站作为异托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反映了现有的伦理困境，更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距离和视角。

参考文献

- [1] Schwartz, J.S. and Milligan, T. (2016) *The Ethics of Space Exploration*.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2] 王影君. 后人类时代的种群危机——阿特伍德异乌托邦三部曲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20(3): 28-34.
- [3] 宋明炜, 毕坤. 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乌托邦变奏[J]. 中国比较文学, 2015(3): 101-114.
- [4] Sandel, M.J. (2011)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91, 1303-1310.
- [5] Sudradjat, I. (2012) Foucault, the Other Spaces, and Human Behaviour.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36, 28-34. <https://doi.org/10.1016/j.sbspro.2012.03.004>
- [6] 萨曼莎哈维. 轨道[M]. 林庆新, 译. 北京: 中译出版社, 2023.
- [7] 宁晓萌. 空间性与身体性——海德格尔与梅洛庞蒂在对“空间性”的生存论解说上的分歧[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6): 59-64.
- [8] 保罗·维利里奥. 解放的速度[M]. 陆元昶,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 [9] 哈特穆特·罗萨. 新异化的诞生: 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 郑作彧,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 [10]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M]. 修订第 5 版.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 [11] 潘可礼. 亨利·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1): 13-20.
- [12] 刘辉. 世界主义与身份伦理[J]. 外国语文研究, 2024, 10(1): 9-15.